

主要通过将营业成本而非期间费用转移至营业外支出的方式虚增核心盈余,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

有学者就年报可读性与盈余反应系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年报篇幅带来的可读性障碍越小,即年报可读性越高,其盈余反应系数也越高,说明年报可读性有利于公司的盈余信息更好地反映到公司股价中。分析师关注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这种正向影响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意味着证券分析师能够有效发挥信息中介作用,并且高质量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改善公司的盈余质量,从而强化年报可读性的信息传递效应。

有学者就政府反腐风暴是否提高企业盈余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反腐风暴冲击下企业一方面降低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另一方面转而采用更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行为;三种盈余管理行为的替代效应也存在非国有企业,但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采用应计盈余管理下降的幅度,采用真实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上升的幅度均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反腐风暴显著降低了企业政治关联是三类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替代的重要途径。

有学者就新三板公司盈余质量进行研究。从制度差异出发,讨论了新三板挂牌公司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差异。发现新三板公司和创业板公司在盈余管理方面呈现不同的特征,新三板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的水平显著高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新三板特有的制度因素对三板公司的利润质量有显著影响,新三板市场中创新层公司、申请IPO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公司、采用做市商交易公司、有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公司的利润质量更高。

有学者就公司债特殊条款、债券评级与会计稳健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债特殊条款数量越多(约束强度越大),发债主体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债券评级越低,公司债特殊条款对会计稳健性的正效应越大。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低以及代理冲突严重的情况下,公司债特殊条款数量对债务主体会计稳健性具有正效应。

有学者就CFO兼任董秘是否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CFO兼任董秘会弱化公司内部监督,使其有更大的空间进行盈余操纵,进而导致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下降。该负向关系在CFO处于40至50岁和外部审计质量差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该研究结论表明,CFO兼任董秘时会借助兼任带来的职权效应,进行更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投资者在关注CFO兼任董秘进行信息披露时,也应关注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监督的有效性。

有学者就高管特质、法治环境与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金融、学术、海外经历与可操纵性盈余呈现负相关,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高管薪酬与可操纵性盈余呈现显著正相关;法治环境与可操纵性盈余呈现显著负相关,法治环境改善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管异质性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地受到公司外部市场环境的制约。公司所在省份的地域文化特征差异、市场化水平差异,是研究上市公司高管特质、法治环境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关系时不可忽视的关键抑制变量。

有学者就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企业债务融资风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投资性房地产中采取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能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风险;同时,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不同的影响,即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风险相较于国有企业影响更大。

三、会计新领域研究

有学者就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投资者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主板投资者倾向于认为承担并披露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一种增值行为,而中小企业和创业板投资者则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持有一种不确定的评价,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偏好隔离”。可以认为主板投资者更接近贝叶斯投资者,因为他们可以理性地分析企业不同程度的社会责任披露,而中小企业和创业板投资者则是一种反应不足的启发式投资者,他们的决策多基于简略的社会责任报告,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理性隔离”。雾霾对投资者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偏好和理性评价具有系统性调节作用,这种作用也存在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上的分割。

有学者就社会责任披露语调、财务信息诚信与投资者感知进行实验研究发现:相对于采用平实的语调,采用积极的语调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投资者感知的社会责任更好;相对于较低的财务信息披露诚信度,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诚信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投资者感知的社会责任更好。在财务信息披露诚信度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与采用平实的语调相比,采用积极的语调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投资者感知的社会责任更好;在财务信息披露诚信度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不论社会责任披露语调是否积极,投资者对社会责任的感知均比较差,且没有差异。此外还发现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语调对投资者感知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

有学者就股权结构特征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一般意义上的公众上市公司相比,股权集中度高的家族控股型上市公司,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更低;股权制衡度水平越高的家族控股型上市公司,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水平更高;两权分离度高的家族上市公司,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更低;管理层持股比例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有学者就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否提高企业的市场表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票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无显著关系。市场对披露评分较高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反应;而对披露评分较低报告的企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负面的反应;且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与市场的表现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研究表明社会责任报告整体质量偏低、公众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较弱是制约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价的主要因素。该研究为企业与监管政策从一味追求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数量的增长向注重质量提升的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有学者就企业社会责任(CSR)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流有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提高CSR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降低

低下期现金持有量,而且主要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改善公司治理这两条路径实现的;CSR信息披露质量对现金持有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且优化制度环境可以强化这一抑制效应。改善CSR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提升现金持有的价值效应。

有学者就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会计稳健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会计稳健性中介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有学者就财务报表误述、误述风险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证据进行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报告)视为自愿性信息披露工具,尝试从信息披露理论来解释财务误述企业是否自愿提供CSR报告。基于此目的,该学者运用部分可观测模型(POM模型)的两阶段程序来估计财务报表误述风险,并将已误述报表在未来可能被要求重述这一情况视为未来公开信息,来探究未来公开信息是否降低自愿性信息披露动机,发现被侦测概率会显著降低企业自愿披露CSR报告的动机。

有学者就社会责任偏重度、产权性质与盈余管理是道德行为还是机会主义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社会责任履行越好的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即支持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观点。相较于偏重履行基础社会责任的企业,偏重履行高层次社会责任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更强。相比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更强,承担社会责任的掩饰作用更加明显。国有企业中无论是偏重基础社会责任还是偏重高层次社会责任的企业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动机,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偏重承担高层次社会责任的企业较偏重承担基础社会责任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更强。

有学者就中国冶金企业环保规制、低碳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保规制抑制了企业绩效,显著地促进了低碳技术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黑色冶金企业中更强;但低碳技术创新并没有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中国冶金企业并不完全符合“波特假说”,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有学者就企业环境表现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是实质性披露还是选择性披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定性披露呈负相关,与单独披露程度和定量披露呈正相关;外部环境管制压力相较于内在企业声誉动力对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管制的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更显著,而提高企业声誉的激励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

有学者就企业碳信息披露的价值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从短期经营成果来看,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初期会抑制企业价值增长,但到一定程度时会促进价值增长;从长期市场价值来看,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企业所面临的公共压力越大,即政府环境规制、媒体关注度和环保组织监督水平越高,该价值效应就越显著。

有学者就资源价值流转会计视角的污染治理思路进行案例研究。从水泥窑垃圾处置工艺出发,拓展研究范围至垃圾废弃、收集运输阶段所形成的生活垃圾协同消纳链,构建组织间的链上资源价值流转会计分析体系,并应用于实践案例的示范中,为我国水泥行业协同消纳生活垃圾的经济性分析提供了新的价值管理方法。

有学者基于法定碳排放权配额经济实质的碳会计构想进行研究。通过考察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依托的“总限-交易制”,提出“二元观”理论视角,将法定碳排放权配额理解为:依法实施碳排放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遵从法定配额进行碳排放的义务。由此,将企业获得的法定碳排放权配额等量地确认一项资产“碳排放权-法定碳排放权”和一项负债“应缴碳排放权-法定配额义务”,建立逐期核销机制,以及按碳排放权配额的交易、清缴和结余等实际管理情境开展核算。这一碳会计方案,可契合“总限-交易制”的环境管制和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经济实质,预期可助力企业低碳转型和国家碳市场建设。

有学者就河道水资源资产确认及计量模型进行研究。为了实现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在对水资源概念分析基础上,界定了水资源资产及潜在水资源资产的内涵,分析了水资源资产具有与水源的交互循环性、多功能性及非消耗性、重复利用性、随机不确定性以及数量与水资源开发目标有关等特点;在提出河道水资源资产的确认条件及计量假设的基础上,根据水资源资产的概念构建了基于使用及供水过程的河道水资源资产计量模型。

有学者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会计人才评价的理论框架、关键概念与运行机制进行研究。尝试从价值创造视角构建企业会计人才评价的理论框架,并研究企业会计人才评价范围等问题;探讨企业会计人才评价的运行机制,重点分析企业会计人才评价的原则,初步构建了企业会计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八因八策进行研究。从经济周期下行、治理机制失效、成本收益失衡、准则导向偏差、委托制度僵化、审计范围受限、规模扩张过快、查弊防弊不力等八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深层次原因,并从标本兼治的角度,提出修改量刑标准、加大经济处罚、完善公司治理、平衡准则导向、改革委托制度、扩大审计权限、淡化规模标准、强化舞弊识别等八项对策建议。

有学者就加密数字货币的会计确认和税务实践进行研究。在区块链与商业结合的背景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主要用于支付和交换价值的加密数字货币为例,分析了加密数字货币的会计确认和税务实践,提出其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框架体系,并介绍拥有数字货币的缴税实体和个人的税务原则。

有学者基于国家治理主体视角的政府财务报告进行应用研究。政府治理主体可以将政府财务报告应用于加强政府财务管理、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助力政府绩效考核、防控财政风险、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等领域;市场治理主体可以将政府财务报告应用于参与公共物品供给、支撑债权投资